

延安美术的当代价值 ——以版画为例

◎包梦雪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革命根据地,大批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为了抗日救亡的使命奔赴延安。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当时文艺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艺术家们选择了可以进行大批量复制和印刷的木刻版画作为主要工具,以简洁、精炼的艺术语言向边区人民宣传革命思想。

一、延安美术的成就与特点

(一)美术创作以人民为中心

在紧张的抗战气氛中,争取民心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当时边区人民文化程度低,只靠文字去宣传和普及革命指导思想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我党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路线,通过美术作品向大众宣传革命思想;其次文艺工作者还参与百姓的生活,了解百姓的真实愿望,创造出百姓能接受和欣赏的艺术作品,从而统一民心,共同抗日。

古元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受到党的文艺思想的指导,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力图刻画农民最真实的形象。《减租会》是古元杰出的作品之一。描绘的是农民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与地主据理力争的场面。作品采用黑白木刻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于这幅作品的创作,古元谈到:“当我看见报上登载绥德农民向地主进行斗争,讨还非法多收的租子的消息,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马上就想创作一幅木刻……我回忆许多开会的场面,我以他们的形象作依据,创作了《减租会》。”虽然古元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但是他能够根据生活经验创作出如此真实的作品,正是他在农村切身的生活经历,才将农民和地主的形象把握得如此准确。这样的作品既贴近生活,还起到了鼓舞农民勇敢站起来的积极作用。

作品《离婚诉》来源于古元工作期间亲历的事件。在1940年,古元以阴刻法制作了《离婚诉》,后来为了迎合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在1942年,“我又重刻了一幅《离婚诉》,和之前的刻法就大相径庭,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法来表现物体,画面明快,群众也就喜欢接受了。”作品截取离婚时的场面,主人公勇敢站出来向封建落后势力和旧婚姻制度的挑战,透析了妇女思想意识的进步,更易于向边区人民传达进步意识。在古元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农民形象和农民主观,创造了具有鲜明大众化倾向的艺术风格,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这一时期的的作品在题材上不同于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而是极大地歌颂人民的新生活,赞美人民的高贵品质,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二)创作大批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作品

江丰在《回忆延安木刻运动》一文中讲到:“延安木刻民族化的探索,有明确的目的,是以群众化为前提,促进木刻作品适应工农兵群众的欣赏习惯,更好地成为激发他们革命觉悟的精神食粮。”

力群的套色木刻《丰衣足食图》,采用民间年画的形式展现人民丰衣足食的情景。画面构图饱满,对于版画语言的熟练运用和民间色彩的借鉴,使得该作品受到了老百姓的喜爱。马达的《推磨》在技法上画家撇弃了早期木刻欧化的明暗画法,采用中国传统的阳线刻制,通俗易懂,画面简练又不失重量感和黑白节奏感。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国内掀起了新年画



创作的热潮,学习传统年画的人物造型,以阳刻为主,色彩鲜明热烈。彦涵的《开展民兵爆破运动》、力群的《人民代表选举大会》和冯真的《娃娃戏》等这些作品都是符合人民审美趣味的新年画形式,受到了广大百姓的好评。

延安美术工作者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创作了大批具有特殊历史价值和体现人民需求的美术作品,不仅迎合了老百姓的审美需求,还极大地传承和发展了民间美术,将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技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整合创新,使其成为中国美术发展的动力源泉,推动了美术创作向民间化和大众化的发展方向。

(三)美术创作是对时代的生动记录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延安的文

艺指导思想决定了文艺工作者的态度立场。

彦涵的部分版画作品被认为是记录抗战最重要的图像文献。1938年他怀揣抗日救亡的赤诚之心投奔延安,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回应了党的号召,同时也鼓舞了广大百姓共同抗战的斗志。作品《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画面描述的是战士爬上战壕准备战斗的场面。整幅画面传达出紧张的气氛,把战争的真实瞬间表现的淋漓尽致,不仅反映了军民同心誓死杀敌的顽强信念,也激励了老百姓英勇向前的斗志。

彦涵的艺术创作是对时代的生动记录,作品《豆选》描绘的是在选举活动中,由于农民不识字,所以用豆子来代替选票,选举人在碗里放豆子的民主选举过程,反映出

伟大抗疫精神的精湛呈现

——读《天使出征——内蒙古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有感

◎马永真

故事来源提供了诠释和写作线索。“手记”还披露了这些故事在当时产生的阅读热度,反映了纸质与融媒体载体同时存在的新闻时代,作为纪实文学——故事在读者中产生的巨大感染力量。

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重要的因素,除了其内容能给人以启迪和信心,就像火把一样为人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和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我愿意相信,刘春的《天使出征》会在我国当代纪实文学榜单中留下闪烁的光芒,因其真实记录内蒙古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英勇壮举,而永载当代文学史册。新冠肺炎疫情终将会过去成为历史,但是《天使出征》中所塑造的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的英雄群像,会永远鲜活地镌刻在广大读者的脑海里。

《天使出征》之所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近距离地目睹了医疗队在湖北省荆门市、武汉市英勇抗疫的战斗,作者与医务人员一样感同身受。甚至基于职业敏感的驱使,较之于医务人员,他能从更多的方面深入观察,悉心捕捉,“动态记录出征的每一天,把思想镌刻在故事里”(《荆门手记》),在书中再现了鲜为人知的抗疫细节(医务人员和病毒是在一米以内博弈)和那些曾经惊心动魄的“战疫”场景,塑造出了内蒙古援鄂医疗队那些“最可爱的人”,写出了“最可爱的人”的精彩故事,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从受众的审



精神,又有精湛的医术,他们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天使出征》以故事的形式,对医疗队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展示。全书最后以《英雄归程》结束,与首篇《目的地:湖北荆门》首尾相顾,相互呼应,“一气呵成”。《荆门手记》选载的13篇“手记”,记录了作者作为一名随行“战地”记者的工作与心理感受,为书中每一章



了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彦涵的系列作品真实地拉近了艺术和人民的距离,极大激发了老百姓共同抗日的决心,也成为了革命思想的宣传工具。这位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在中国版画史上留下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在抗战时期,延安美术起到了宣传教育的功能。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将其鲜明的政治立场用视觉图像的方式呈现给广大百姓,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延安美术的当代启示

延安美术的艺术成就和特点在今天看来依然给我们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经验和启示。

(一)艺术创作要根植于人民,贴近生活

延安时期的美术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主动了解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样貌及民间美术的形式风格,用老百姓熟悉的形式语言去创作,让作品更贴近大众,传递真情实感,不仅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而且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因此文艺作品在任何时期都要把握人民需求。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美好理想和未来的执著追求和努力,而一个画家的担当,莫过于通过文艺作品表现出对自己生活着的这个时代的人文关怀。

(二)艺术创作要紧紧围绕时代发展勇于创新

延安的木刻版画并没有完全照抄新兴木刻版画中欧派的技法,而是结合延安的实际情況给予了取舍,他们撇弃百姓看不懂的阴影画法,结合民间的艺术表现形式,以一种全新的、更适合百姓审美的艺术形式表现新生活,使得这一外来画种得到了中国式的改造。这样的创新也为延安的木刻艺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今的文艺工作者当然更需要这样的创新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审美需求的改变,有的绘画语言已经不适应新的艺术发展要求,所以当代美术工作者也需要像延安时期那样寻求符合自己时代的绘画语言,在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敢于创造,探索更能体现当代画家真实感受的全新绘画形式。

(三)艺术创作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在延安时期,美术家配合抗战时期不断变化的斗争形势,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创作了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在新时代,我们要坚守正确的文艺方向,文艺作品要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握时代精神,展现时代品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应该自觉贯彻的信条。党和国家给了我们的艺术家们以创作自由的权利,我们的艺术家们理应考虑到自己艺术实践对党和国家应尽的义务,应负的责任。”今天,文艺工作者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的权利,但是我们要主动担负起国家赋予文艺工作者的职责,立足于当下,让文艺作品符合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符合当代社会的审美要求,要立足于中国传统艺术,要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吸收借鉴国际当代艺术理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经典名著与喜欢玩梗年轻人的一拍即合,往往能催生出花样翻新、令人叹服的创意效果。当前,一些年轻人以种种方式“花式”演绎《红楼梦》,就不免使人眼前一亮。

最近,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怼人话语在网络上翻红,很多网友模仿黛玉语言风格造句引发热议,折射出《红楼梦》在当代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而除此之外,在许多高校,“红楼”研究社团蓬勃发展,不止于传统的读书会、讲座活动,莘莘学子或在毕业作品中设计红楼文创家具,或将《红楼梦》中相关元素融入绘画、雕塑、插画、摄影作品,抑或,从医药、健康等独特视角品读《红楼梦》,以及在视频网站二次创作剪辑《红楼梦》等等,让人感受到经典文化在传承与创新方面的独特魅力。

经典之作,它们经受岁月洗礼,总能历久弥新。对此,卡尔维诺说得好:“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就拿《红楼梦》来说,自古而今,种种对其解读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原著及其解读内容究竟是不是读者盘子里对胃口的菜,最终还需要读者自己细细咀嚼、消化吸收。

我愿意相信,那些以其自身才华“花式”演绎《红楼梦》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有着活跃的思想,而且,在与这部名著牵绊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而当他们将这种“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以契合己意的方式呈现出来时,这对他们自身文艺趣味的提升是潜移默化和实实在在的,同时也势必影响带动周围更多沉浸其中,进而增强其对于经典名著的亲近感。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让经典名著广泛深入地走进大众生活,正襟危坐字斟句酌是一种方式,像这种不怎么循规蹈矩的“花式”途径,同样不失为方便奏效的可行方式?

当然,凡事过犹不及。年轻人“花式”演绎《红楼梦》固然令人欣喜,不过,“花式”演绎亦需有度。对此,正如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的,“不同学校可以突出各自特色,发挥更多创意,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对经典文学抱着尊重的态度,无底线的恶搞不可取。”

关于“经典”,《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阅读经典,能给人更多的滋养,使人明锐、深刻而优雅。尽管,多数人对于经典作品存有敬意,然而毋庸置疑,相比于一般读物,经典阅读对读者知识水平和阅读能力的要求又要更高一些。在这个推崇全民阅读的时代,既然,“花式”演绎有助于吸引读者,有助于促使经典复活,那么,但愿社会相关各方能够因势利导,扬长避短,不断探寻更富意趣的方式,引导大众与经典亲密接触,使经典更好地传承下去,源远流长。

點睛



(本版4月14日刊发的文章《纯真朴实,更具超乎寻常的感染力——读^{许廷旺}动物小说集》,作者为:张锦陀。)

演绎经典亦需有度

◎周慧虹